

## 寻穷关河高低景，念尽长安内外碑：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小记

黎鏡明 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生

步入碑林回廊，《乾隆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也许是第一个激发游人好古之心的碑刻景观，相较于大批有幽居陈列室、以“扎堆”面目示人的汉唐名碑、元明书法，这块占据C位（进门左手）、衣衫华美（为四角碑亭所包裹）、身材修长（高约2.5米）的清代作品无疑显得突兀，似乎经不起细细思量。然而考诸史籍，碑林在清代为陕西府学（学宫）所在，“左庙右学”自唐迄清始终是学宫的基本空间格局，每一位试图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读书人，都是从告成碑旁的棂星门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当告成碑由京师太学而逐渐造作于各地府、州、县学时，各地的知识精英在祭拜孔子时熟悉了告成碑所记载的边疆事务，经由这一日常礼仪，帝国实现了由告成太学到告成天下的宣传攻略。

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到宝鸡周公庙、固原姚河塬，每一处沉默的遗迹都成为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学子“审问”的对象，千年前的史弥射家族冢木已拱，但残泐的墓志道出来华夏特人的生命轨迹；宝鸡姜嫄庙前世代有人焚修祝厘，然而其信仰功能从“高禘”到媒神、求子神，层累着关中的历史记忆；姚河塬遗址发现迄今难得一见的青铜作坊（全国不超过五处），车马坑和墓葬显示该处应为周王朝的一个边疆驻守机构，访问历史现场如同扫描二维码一样成为学子的日常，通过对遗迹的情景式解读，其后隐藏的复杂历史信息一一浮现。

### 从差异中寻找意义

2018年7月30日，由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主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合作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文史相关科系承办的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在西安开营，此次研习营主题聚焦“关中·外缘”，学员招收面向两岸四地及留学海外的文史哲相关科系博士研究生及青年教师，最终确定52余名正式学员。授课阵容汇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黄进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明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李孝悌、哈佛大学田晓菲、北京大学荣新江、复旦大学葛兆光著名作家贾平凹以及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王欣教授等。通过专家授课、文献研读、田野调查、分组讨论、学员报告等形式，培养两岸（三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田野调查的兴趣与习惯，透过实际的田野

考察和地方视角，对文献有深刻而新鲜的体认与解读，同时促进两岸文史科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知识交流与激荡。

研习营的讲座主题或聚焦于关中的区域文化、或着眼于对西北地区的整体关照、或从边缘视角注重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反思性研究，不乏在史料运用、研究范式乃至学术理念上都具有垂范意义的名篇。而对学子而言，最有价值的地方则在于获得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打破壁垒森严的学科区隔，尝试用其他学科的视角切入问题、尽力用其他学科的语言对自己的体会进行复调重述，从而避免让学术探讨沦为“聋子间的对话”，从差异中寻找意义。

## 文本与情境

王明珂先生长期躬耕于文本、表征情境的辩证关系，注重对华夏边缘历史面貌高清晰度的深描，进而提醒研究者警惕从“中心”立场居高临下的历史论述，王明珂先生认为，至少自汉晋以来，许多中原士人生活在帝国、郡县、家族三种情境之中，对应产生了正史、方志、族谱三种文本，帝国、郡县、家族各有其结构，与之对应的文本亦各自形成自己的书写结构，以保证合宜的文本记忆被产出，进而强化现实本相，正史的书写者通常兼具官员和士人两种身份，因此正史往往表现出对典范的遵循，而一些边地士人和少数民族书写的文本对文类结构的违逆，表现出作者居于帝国边缘之情境及其个人在此情境下的认同情感。葛兆光先生以存世多种苗蛮图为素材，指出《苗蛮图》背后是帝国扩张下的州县与臣民，进而中国民族史研究不断追问：现在的“苗族”是一个“民族”吗？“苗族”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和起源吗？“苗族”的族群认同是怎样建立的？

## 共相与殊相

王欣先生具有新疆吐峪沟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多次的田野调查经验，此次讲座主题《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交融与构建》正是以这一区域景观为论述起点，该麻札是一处由佛教场所转变而来的伊斯兰教圣地，在“圣墓”外表下隐藏着其他宗教的“景”，其特殊面貌是维吾尔族先民依据自身萨满教文化传统，立足当地所积淀的丰厚文化土壤，对外来伊斯兰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吸收、改造和重构的结构，以此深化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其更深层次的关怀或许在意提醒学子思考：一个族群怎样记忆、回溯、叙述过去的事实？

田晓菲教授的《埋或烧：中唐时期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转型》杂采郭季产《集异记》、刘义庆《幽明录》、段成式《酉阳杂俎》等魏晋至晚唐志怪小说、笔记等，利用这些被传统史学视作“边角料”的素材，确定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弃去了传统学

制下的诸多繁腐，揭示了中国文学“索物以托情”的传统。冯梦龙曾言“史统散而小说兴”，或许囿于文史之间的分野，史学出身的学子在叹服之余，对田氏所用材料时间性的缺失（中晚唐有别于其他朝代的地方在哪里？）、材料的片面性（如《太平广记》由民间集佚而成书，著者在集佚过程中秉持何种立场对材料做了哪些取舍？）措意不一，对于王德威先生而这些留白又成为新一轮思考的起点。

## 学风与世风

以“天下第一所”名垂于世，史语所以对台湾中国史研究影响的全面和深刻自不待言，而其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浮沉或许是研究“学风”与“世风”关系的绝佳个案，黄进兴先生此次的授课专题《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史语所研究之旨趣〉》对该所创始人以及“永远的所长”傅斯年先生学术思想做了深入评述，20世纪初正值德国兰克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风云交汇之期，傅先生因留德等机缘最终踏入兰克的河流，主张史学即科学，从而确立了史语所注重实证之学风，认为历史的全部工作就是搜集和考证材料，以待事实来解释自己，然而迁台之后，由于岛内新生代学者大多留学欧美，西风所渐致使此辈转而拥抱社会科学，对史语所有“只考史不著史”的批评，乃至有“研究一辈子春秋却写不出一部春秋史”的讥讽。洎乎70年代，由于“眼光向下的革命”，社会史、医疗史、身体史等遍地开花，史语所传统的制度史、政治史研究则渐显颓势，人类学出身的王明珂先生继任所长代表着的是一种传统的“失守”抑或别样的新生，或许要穿过世风去看待。

纸短意长、草草不尽。最后以此次王明珂先生的一句讲演作为结语：“我们很喜欢对历史的不同诠释，但对历史真实永远保留一种谦虚的态度”。